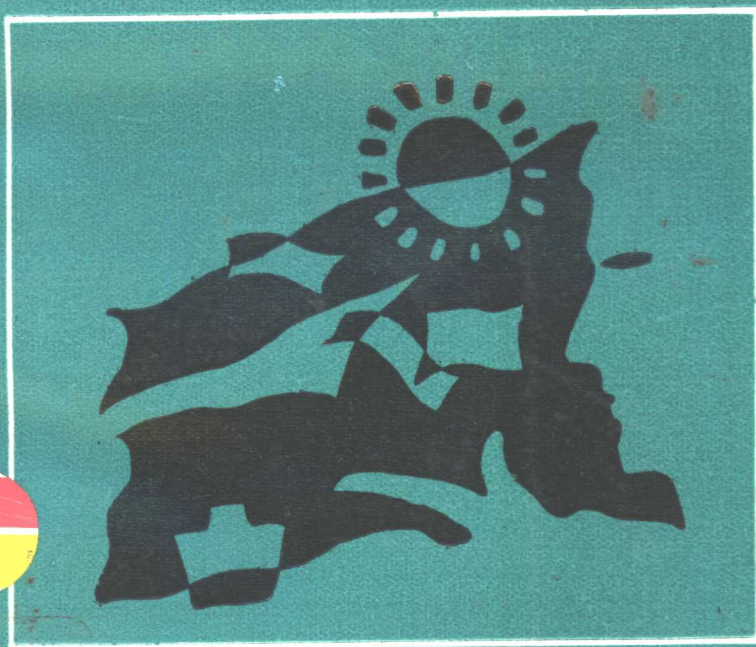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文库

终身教育导论

〔法〕保罗·朗格让 著
滕星 等译



华夏出版社

终身教育导论

〔法〕保罗·朗格让 著

滕星 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88年·北京

责任编辑: 志 华
封面总体设计: 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 徐天离

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
by
PAUL LENGRAND
Croom Helm Ltd, London, U.K., 1975.

终身教育导论
〔法〕保罗·朗格让 著
滕星 滕复 王箭 译
石叶 滕复 校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 开本 5 印张 113千字 插页2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053—291—7/G·049
定价: 2.20元

序 言

本书的目的旨在阐明终身教育思想的各方面重要意义，指出哪些因素有利于它的发展，并揭示它的范畴和说明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全面的教育尝试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

显然，本书是配合国际教育年所写的，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十五届全会上，把终身教育作为与国际教育年有关的思想 and 行为的12大主题之一，推荐给成员国。

本书的作者保罗·朗格让，是成人教育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1948年以来，他一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一名成员。他通过个人的研究，为阐明终身教育的思想作出了贡献。此外，他还一直积极从事于这一思想的宣传工作。

本书阐明的观点只是作者本人的看法，并未反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人的意见。

前 言

终身教育是一个正在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经常谈论和争辩的题目，甚至在政论家的演说中，它也是谈论最多的话题。那么它的应用范围怎样？具有什么意义？它能够作为一种分析的工具和行动的指南被有效地加以利用吗？这些就是本书下文中试图予以解答的部分问题。就目前的成果和思考的水平来看，多仍限于介绍概念和开拓思路之类，尚无人敢说已经做了更多的工作。因此，作者谨慎地把这本书称为“导论”。

本书分为两篇。第一篇，笔者试图展示在不同的阶段中终身教育的合乎逻辑的、有机的发展。首先，他指出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对于这些挑战，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不愿意看到自己处于劣势的话，他就应该在智力、体力和情感上有所准备，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认清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对问题的性质也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意识；必须有这样一些能够否决、辩驳、追求以及能够做出决断的人们——换句话说，必须有某些否决、辩驳、追求或决断的力量。本书谈到了某些能够起这样作用的力量：它们的影响就是能够单独产生变化的动力。

这本书对终身教育的意义、范畴和目的进行了大量分析，最后，对教育活动提出了某些战略设想。它强调在思想和成就这两方面，要把适用于儿童、青年和成人的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性。

第二篇的目的是论证一些命题和阐述前一部分中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某些问题。

本书是专门为国际教育年而出版的，它不仅面向教育专家，而且面向一般公众，对所有的人来说，教育的未来已经成为一个永存的令人关切的问题。

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

主 编：邓朴方

常务编委：李盛平 张宏儒 肖金泉 贾 湛 王 伟
沈志华 黎 鸣 吴携深 张显扬 陶德荣
褚朔维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沛	马在新	王 焱	邓正来	孙立平
孙连城	刘再复	李泽厚	朱青生	朱庭光
邵大箴	何家栋	吴衡康	林 方	范 进
张 琢	周 星	顾 昕	倪文杰	俞敏生
郭建模	唐 枢	高 崧	程方平	缪晓非

教育学分编委会：

程方平	毛祖桓	吴忠魁	王大龙	王伟廉
滕 星	帅 扬			

目 录

序言

前言	(1)
终身教育探索	(1)

第一篇 尝试性综述

第一章 现代人面临的挑战	(21)
第二章 起作用的各种力量	(33)
第三章 终身教育的意义	(45)
第四章 内容、范畴和目的	(54)
第五章 关于终身教育战略的建议	(66)
第六章 一项共同的事业	(78)
第七章 结论	(83)

第二篇 论证与说明

第一章 与终身教育相关的诸项目标	(87)
第二章 内容和方法	(101)
第三章 一种特殊情况：正规教育	(115)
第四章 着眼于职业管理的学校教育与终身教育	(124)
第五章 石头与人	(138)
第六章 同作者的谈话	(142)
后记	(149)

终身教育探索

当我们这代人20岁的时候，我们所期望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期望一种有意义的人生，它不仅能给我们带来生活的满足，而且也应该能为我们提供沿着知识、情感、艺术和诗一般小路不断前进的机会。当然，我们所期望得到的不止这些。我们还需要贡献的机会，去创造一个对我们自己、对他人和整个人类来说都更加美好的世界。然而，我们的抱负又怎么能脱离现实呢？当世界其他角落仍处在恐怖和专制统治之下的时候，个人要建立一个和平、欢乐的天堂，是既不可想象，也不能接受，更不是现实的。下面一些事实，不幸地证实了我们是正确的。

在本世纪30年代，文明陷入了危机。这恰恰表明，我们今日所见所闻的如此频繁的危机并非是新鲜的事。

我们曾处于极度困境之中。一方面，我们不能同一个无法接受其存在和价值的社会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一个更坏的选择则是：种族偏见的得势和形形色色的非理性的泛滥以及应该避免的趋向野蛮状态的倒退。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逃避这场迫在眉睫的大战。

政治曾经是我们改善个人和社会生活结构及条件的有决定意义的方法（对某些人来说，是唯一的方式）。我们从权力出发，更具体地说，是从假定的权力出发去思考各种形势和问题。那么，在那样一个其结构和制度中存在着障碍的秩序混乱、特权炽盛的不合时宜的社会里，我们能够发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改变它。

在那个时代，人们想象只要能改革社会制度和体系，改变政府的性质，一切就都会走入正轨。恶人将被驱逐，无能者将被斥退；由善良和高尚的人们掌握自己的命运，铲除腐化行为，真诚地以献身精神治理国家。正义将依照新的法律和新的社会关系在个人之间和团体之间实行统治。

对于那个时代的体验和反省很快把我们引上新的思索和行动的途径。的确，我们中间没有人怀疑，或者曾经能够怀疑政治行为重要的和根本性的作用。它提供权力和工具去克服抵抗的力量。当我们回顾现代文明所取得的最富于意义和价值的种种进步时，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些进步不是来自智慧和理性，而是来自政治利益与野心，要求与反抗的相互作用。

然而，我们中间一些人已经在外界启发下迅速开始改变思考的方式。虽然他们承认在政治态度和政治交易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决定意义，但他们却不得不在他们关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展望中考虑另一些因素。这个视点在当前就是教育，更确切地说是成人教育。

我们完全可能对这一观点的转变产生共鸣。政治行为要求各种简明的方式，它避免采用隐晦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方法。政治行为有其要达到的种种目的，人们依照这些目的，形成敌与友、善与恶的分野。或许这种状态是必要的，并且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人（也许大多数人）都发现了这种划分的相当可信性，但我们却不以为然。我们不能不意识到人性的复杂与种种矛盾，意识到每一个人，无论他站在哪一边，都是理智与愚蠢、慷慨与自私的混合体。斗争的责任迫使我们不去注意我们的真情实感，然而只要机会一到，这些情感又显露出它的全部本质。

或许正因为我们具有对人类状态的差异与一致做出反应的这

种特性，所以我们能够逐渐开始确立我们自身的目标，而不是政治斗争的目标。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对长期目标的关注。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怎样短暂，都是由许多事件组成，都要经过许多阶段。它经历了一定长度的时间。我们无法相信，人一生的抱负会只局限于达到一个特殊的目标，无论这个目标可能是多么高尚或远大。

最后，我们谈谈人们的不同气质、思想和观点。某些人将注意力放在人类现象的集体性方面。他们的兴趣被群众，被起作用的力量，被社会结构和制度等问题所占据，认为这些才是重要的。在他们看来，个人将逐渐被融进这些巨大的模式和结构中去。另一部分人则相反，他们首先意识到以个人的形式存在的人类经验。他们最有兴趣的是那种单独的，唯一的，不可代替的个人生活经历，一种意识的觉醒，一整套思维、情感和同自身以及同特别相对于个人来说的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还有他自己的、总是与别人不同的处理和解决他在自身内外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特殊方法。

我们在最后还要分析指出：在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方法与也许可以称之为心理学或哲学的方法（因为尚无一个更好的术语来表达）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职能分工。但是显然，两种方法不存在优劣之分，它们都将自己的光和热贡献给人类的知识。然而，实际上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说，如果人们承认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的本质、身体和性格的话，那么，第二种方法就是教育工作者们的方法。毕竟，精神、躯体和性格只能属于处在现实和变化中的特殊个人那既有限又无限的范围，此外别无其他的选择。

因此，如果这些涉及不同概念和兴趣的考虑，同我们生存的时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驱使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不一致，那么，这些认识本身就不足以促使我们坚定地走上教育活动的道路。在人类

历史上，至少在世界某些个别地区的历史上，曾有过若干安宁和平的时期。但是对我们西方世界来说，我们的运气并不佳。

1935——1945这十年间，或许可以看做历史上一个意义极为重大的多事之秋。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一切都危若累卵，无论是个人的命运，还是民族和人民的集体命运都一样。以至善与恶分明得可以一目了然，真是泾渭分明，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这一方面否定了两千年来人类为摆脱奴役和偶像崇拜所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各个种族和各个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兽性的狂热，反对愚蠢的、蔑视人性及追逐权力的邪恶势力的联盟。可以说，斗争与牺牲，力量聚集与技术革新以及战争命运等因素都有利于人们认定的善的一方。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当时世界的命运和未来由战争的另一方赢得将会怎样？当胜利和自由曙光初照的时候，许多朋友认为，时代已经为他们顺利地夺取权力开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局面，而改革社会制度和结构这一主要目的，将优先于任何其他目的。我们掌握控制的手段将取决于所遇到的反抗形式。暴力和专断自然不能排除在外，即使他们不是有意地追求它们。

为什么我们在那个时代不能采纳这样的观点？今天回过头再看看，这观点对我们十分清楚和有利。但是，在那个时代，事情却并不能被看得那样清楚。我们宁愿相信自己的直觉，更多地去讨论我们不能做什么，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其中包括，我们不能使自己去分享某些热情或感受某些欢乐。

显然，对我们来说，政体根本变化的时机已成熟的迹象并没有出现，尽管这种情况也许是可以指望的。

事实上，尽管有一些并非无足轻重的改革和成就，尽管利于社会上许多地区的国民收入有一个持续的增长，决策的权力仍然不断地落到少数人手中，他们越来越少地受到制约，无论在金融

界、工业界、还是在政治界都是如此。人们远不是已经沿着自由和责任之路前进了。我们对构成公众生活实质的每件事物的协商权力，看来也受到更多的限制。

在那个时代，我们对于社会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发展路线并不了解。而那些比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去考察未来的人们，也许能预见到民主制度、道德和思想的衰微。在当时，我们的“智慧”只限于想到革命不会立刻发生——那些设想，没有一个能因现在已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令人十分满意。

然而，从这里我们得出了与工会和政治组织不同的结论和选择。他们认为：工人以及其联盟为了决战，必须保持某种持续的准备状态，以及保持一种战斗的、几乎是军人般的精神状态。

众所周知，军人精神，无论它一开始表现如何，都已明显地趋向简单化，它不能容忍讨论或主观见解，它通过命令和指示来证明自身的智力。除了在有限的战术和策略等方面外，决不允许有任何自由和灵活性。这是对具有暂时优势但却意味着长期灾难的教条主义精神的肯定。军人可以希望其上级对所做的决定有所准备并为之献身。但是，却几无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局势和目的的确切信息。

因为上述种种个人的原因，我们发现，很难投奔到这类旗帜下，但是，关键是我们并不相信这是一条能够通达我们所期冀和希望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之路。

那么，即使我们能懂得为什么军人精神暂时是必要的，对于军人精神的一些长处，我们也只能从严格的有限意义上去认识。可是，在产生这种军人精神的环境消失以后，继续保持这种军人精神，就失去了正当的理由，并变成一种极为有害的因素。就我们看来，工人阶级运动的领导者们，当他们按照崇高的信念以及为了常常是高尚的理由去行动时，并不努力在工人中间发展自由

探求精神，开阔多视点的、独创性的视野，而恰恰这些才是对现实和行动的科学态度以及思维和存在的观念成熟的标志。一旦他们受到政治活动神秘状态的启发，他们的目的就指向对群众的严密管理。为此，思想灌输就成了一个必然性的前提。

因此，处在这种特殊地位，我们这些在某种范围上来自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呢？正如他们所说，我们已经将自己的命运同人民连在一起，但是，我们并没有同劳动阶级同甘共苦；虽然我们享有一点儿教育所给予的优势，我们却往往缺少人生的经验。这种选择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我们加入了并壮大了那些通过他们日常的活动一步步去捍卫工人利益的阶层，即使是困难重重，我们能够做的也总是保持沉默，服从命令。

这就是所谓贡献。它有其庄严和存在的理由，纵然人们不仅要以牺牲时间和精力向它酬付昂贵的代价；纵然它意味着人部分地失去自我。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人选择了这条道路，但是我们也并不因为有一些萌醒的人而感到奇怪。

我们没有勇气作出这种牺牲，也不认为这是充分运用我们特殊能力和经验的方法。按照职业而言，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这意味着20年的学习、实践、接触与交往、阅读和研究，赋予了我们某种进行指导、交流思想和获得交流语言的能力。由于爱好和职业，我们建立和发展了在各种社会背景下不断更新的对话和交往；战争象给予我们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给予我们跟那些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和工作背景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机会。有了这种准备，我们感到从技术和道德上已然可以去为某种教育做出我们的贡献，在这种教育中，成人间交流和交往的经验可以继续得以深入，当人们经历并实践这种工作时，他就会形成一种爱好，这种爱好将持续一生。但是，我们也开始感到，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无论多么重要和必须，却仅仅是一种准

备，一种真正的教育过程的不甚完备的预示活动。这种教育，只有在我们的同辈人，即成年人中实施时，才呈现其完整意义和全部余地。我们感到：教育的整个未来与这种承担培训和教育任务的新制度的建立和发挥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所经历过的环境有利于这种教育的大胆实践。当时，在我工作的东南部小镇，由于反对占领军斗争的需要，一大批年轻人聚合在这里，这真是机缘巧合。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他们的出身，所受教育的程度以及社会与文化背景极不相同。有狂热的天主教徒，有绝不比前者逊色的共产主义者，有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几位哲学家和零星几位文化人。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已有工作。除了在指挥和组织方面的特殊经验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纯属“初出茅庐。”

可以说他们是一种罕见的成熟与极端的幼稚的混合体。事实上，这正是发现世界和自我的时期；正是振奋精神，猛虎添翼，丰富想象力的新生与再生时期，甚至对那些几无可能进入这种冒险的人和那些因性格所限大多数都想在这种制度内居处安然的人，也是如此。

我相信，正象随后的种种事件所证实的那样，他们中的大多数想要深深置身其中的使命并不是教育，而是技术和政治。不过，我这里的目的不是写一本历史，写历史这里可不是地方，我只是要说，撇开他们不同的社会背景、工作、兴趣、以及哲学和政治信仰不谈，使这些年青年人走到一起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已和教育发生了联系。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在抵抗运动中，他们获得了那种抵抗精神，这一精神在它所触及的所有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抵抗运动”这个词当然包含了有时会相互冲突的各种因素、各种感觉和各种利益。可是，那些从头至尾

经历了抵抗运动的人，则在这个运动中找到了两个基本追求：向往社会改革和向往人类兄弟般的和睦。对改革的兴趣产生于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已知的世界正在崩溃，由各种制度、机构、信念、神话和关系网络构筑的传统的大厦已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在那些自命为这座大厦的捍卫者们的思想和良知中也已不复存在了。也许这只是一种错觉或半错觉：虽然事实上还没有新的世界产生出来以代替旧的世界，但旧的世界却仍然在继续衰败下去和失去民心。我们每天都有充分的事实证明这一点，从社会体系的裂缝中不时发出震撼人心的爆炸表明着一种新的精神即将在各地出现。然而，有些东西并非半错觉，用他们中的一个人的话来说，叫做“人的汇聚”，它是一个充满了重要和丰富多情节的长篇故事。简言之，这些年轻人在他们的成年生活刚刚开始时，连续几个月始终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战斗中经历了激烈的时刻，也忍受过漫长的无所事事的等待。当时发生的一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事。摆脱了陈规陋习的人们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力量和才智，而这些力量和才智曾被常规和种种限制所窒息，其显露自身的机会曾被禁止和压抑。现在，被生活耗尽了灵性的人们身上出现了新气象，个性在宣说自我，能力在向外界显现。

如果有三个因素联系在一起——一支由有各种才能的人组成的队伍、令人振奋的历史环境以及一系列来自积极的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具体需要——将使法国的几乎前所未有的成人教育实验成为可能。我把自己与成人教育的联系、对其负有责任并发挥作用看作是最大的幸运。我在工会大楼里有办公室，并被委任建立一个工人教育中心，以后又从事它的管理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培训工会领导人，一般来说，这些人将致力于抵抗运动新社会组织的领导工作。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有了非常显著的实用倾向，环境迫使我们这样做，而且，这也符合一种学说，一种在最近这些

年里，我们有时间思考、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去试验的，或多或少为我们自己制定出的学说。我们仔细观察了所谓法国大众文化以往的那些成就，决定沿着根本不同的道路走下去。

我们认为：激发前几代人的热情和活力的大多数活动的脆弱性和与此相随的缺乏持久性，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理论上的谬误。我们的前辈已是传统文化思想的囚徒，因此注定要失败。他们把文化看做是世纪演进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总和，看做是科学、艺术和文学各个方面的经验和成就的总和构成的一个独立领域。既然它是一个领域，因此人们或可以进入这个领域，或仍然留在外面。一旦人们进入这个领域，便能用他所接受的教育形式、他的爱好和兴趣，或多或少占据其中的一块领地。有些人长于历史，有些人在地理学方面有成就，还有些人在数学或文学方面有造诣，等等。

如果人们运用“文化地理学”的概念，那么显然可以看出，在享有“文化生活”上，存在着极大的机会不均等。有的人文化知识丰富，有的人文化知识贫乏；有的人享有特权，有的人是牺牲者；有的人初步接受了文化知识，有的则还是文盲；有些人有受到完善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的权利，并学到了交往的方法和语言，也有些人，他们的知识和学习途径都十分有限。

人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一代又一代献身于为民众服务的教育工作者都有一个主要的目标：消除不平等，广开通向文化的门路。这样，他们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精致齐整的知识体系的传播者。推测我们批判态度的原因和根据，并非难事。我们承认他们的意愿是光荣和高尚的，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种方式中，有许多错误和谬见：关于知识和文化本质的错误见解，错误地将种种可回溯到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经历的具体模式当成文化本身，并在这种特定情况